

## 语言、社会建构和国际关系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

**[内容提要]**近年来,社会建构主义不仅显示出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与活力,而且逐渐确立起它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主要地位。本文探讨了社会建构主义中一个重要的但经常被忽视的核心成分——语言作用。语言作用问题也是社会建构主义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主要区别所在。正确理解这些区别既有助于研习社会建构主义关于语言作用问题的理论,也有益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和利用这个研究视角,这不仅涉及到“什么是社会建构主义”的含义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建构主义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语言作用 社会建构 建构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

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社会建构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一种新型研究视角。近些年来,社会建构主义不仅显示出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与活力,获得更多人的认可,而且逐渐确立起它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主要地位。与此同时,社会建构主义在产生、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分支。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学科里存在着不止一种社会建构主义,而是多种不同的社会建构主义。其主要原因是,社会建构主义受到不同的西方哲学流派和社会理论的启发,它们反过来规定并影响着国际关系学科里社会建构主义不同分支的形成和发展。

近年来,为了使社会建构主义日趋成熟,一些国际关系研究者开始进行学术反思,提出“什么是建构主义”的话题,并对社会建构主义的未来可能发展方向展开讨论。<sup>①</sup> 本文不准备对国际关系学科里社会建构主义诸分支之间的异同作一般性叙述,<sup>②</sup> 而是侧重探讨它们之间区别的一个主要方面:语言作用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什么是社会建构主义”的含义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建构主义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

### 语言哲学:社会建构主义的重要基础

社会建构主义深受西方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国际关系学科里,当社会建构主义试图

揭示语言具有建构世界政治“现实”的作用时,它所受的启发和引导来自西方哲学关于“语言的转向”理论,包括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奥斯汀的“言语行动”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等。

一般地讲,现代“语言的转向”理论被认为始于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sup>③</sup> 它促使西方哲学界提出重新考虑自笛卡尔以来的思辨方向,呼吁哲学家关注语言的社会性质,而不仅仅关注传统上有关经验领域里主客体之间的区别。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即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面镜子。如果说语言是具有含义的,那是因为它可以对事物、行为和“外部世界”的特征进行“客观”、“准确”的描述和再现。维特根斯坦质疑了这一认识,指出语言的使用是人们对世界现实进行构建的一种行

<sup>①</sup> 可参阅 Stefano Guzzini: "A Re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2000, pp. 147 - 182; Karin M. Firke and Knud Erik Jørgensen (eds.),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xt Genera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 Maja Zehfuss,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Press, 2002); J. Sarm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5 (2003), pp. 325 - 342。在中国,尽管社会建构主义是一种“舶来品”,但是,随着这种研究视角在中国得到借鉴,一些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对“社会建构主义”进行再思考,可参阅“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

<sup>②</sup> 关于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社会建构主义基本流派的介绍,可参阅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78-85页。

<sup>③</sup> 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为方式。在他看来,语言的含义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与外部世界相吻合,而在于它在实践中是如何被使用的。<sup>①</sup>也就是说,语言的含义不在于它是否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而在于人们在彼此的社会沟通中以一定的方式对语言加以应用,即他所称的“语言游戏”。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后来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提供了一种研究出发点。在西方,英国的约翰·L·奥斯汀(J. L. Austin)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美国的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约翰·塞尔(John Searle),以及德国的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人均受到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的理论和思想推动了不同建构主义分支的形成和发展。譬如,近年来,奥斯汀的“言语行动”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引起反响,受到一些国际关系研究者的重视。<sup>②</sup>

人类的语言活动大体涉及语言体系和语言应用两个方面。但是,长期以来,语言研究在西方一直都集中在体系方面,<sup>③</sup>而对语言应用的研究则由于各种理由而被语言学家所忽视和搁置。也许正因为如此,首先提出语言应用问题并对其进行认真研究的不是语言学家,而是哲学家。20世纪50年代末,约翰·L·奥斯汀提出“言语行动”理论,不仅探讨了语言应用的问题,而且从哲学角度解释了语言交流的本质,提出“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这一命题。传统的哲学家一般对句子的真实价值感兴趣,认为人们使用句子的目的是陈述某个事实,或者是描述事物的客观状态;说话和行动是两回事情,行动是通过“做”而不是“说话”完成的。奥斯汀则对这一假设提出质疑,因为他发现有些句子并非用于陈述事实或描述事物的状态,人们也无法判断它们的真伪。事实上,说话者使用这些句子“做”某种事情。也就是讲,说话者在说话时,并非总是在陈述某件事情,而是在做某件事情;说话和行动是一回事:说话就是在做某件事情。这乃是奥斯汀“言语行动”理论的核心含义。<sup>④</sup>

哈贝马斯通常被认为是批评理论中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所提出的“沟通行为”理论被认为是他所有学说中最具特色、最有影响的部分。

哈贝马斯提出人类行为的两种基本类型——战略行为和沟通行为,并对它们加以区别。他承认“战略行为”在整个人类活动层面占有重要地位,但这种行为存在着局限性,因为它往往寻求通过影响客体的方式获得自我利益的满足或实现自我在物质世界中的目标。在哈贝马斯看来,许多目标只有与其它行为相协调才可以实现。于是,他提出了在本质上不同于战略行为的另一种行为概念即沟通行为,这种行为旨在强调行为体通过语言工具进行相互争论或思想沟通而达成理解和共识。哈贝马斯认为,任何政治行为的正当性及合法性应该由经过对话沟通而达成的共识来确定,而不应该由某种理论加以说明,因为经沟通而达成的共识具有理性的基础;它不是来自任何一方的强制行为,语言里存在着“不用武力”达成相互理解的理想。<sup>⑤</sup>因此,他认为,民主社会的棘手问题与其说是从物质方面(譬如以权力和金钱作为主导工具)寻找解决难题的途径,还不如说是谋求通过平等的沟通行为而达成“非强制性”的共识。

沟通就是对话。合理的沟通行为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乃至整个社会的良性互动。关于如何实现沟通行为合理化,哈贝马斯提出了两项基本措施。第一,选择适当的语言进行对话。对话双方必须选择一种能够使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语言来表达自己。凡是有沟通行为的地方,便有言语行动的出现。反之,每当言语行动受阻和被歪曲时,合理的沟通便不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Seco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G. E. M. Anscomb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first published in 1953), pp. 1-2. § 1.2. 目前,此书至少有两个中译本,(1)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汤潮和范光棣译:《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2)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李步楼译:《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② 长期以来,语言被认为只是与“外交”和“谈判”有关的分析变量,因此,在以(新)现实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不过,当语言哲学被引入国际关系领域后,这种情形开始发生变化(至少在西方学术界如此),可参阅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Charles Rustin, “Habermas, Discourse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Justice”, *Alternatives*, 24 (1999), pp. 167-193; Jaye Ellis,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the Legitimacy of Rules: A Discourse - Ethical Approach”, *Alternatives*, 27 (2002), pp. 273-300; Martin Weber, “Engaging Globalization: Critical Theory and Global Political Change”, *Alternatives*, 27 (2002), pp. 301-325; Duncan S. A. Bell, “Language, Legitimacy, and the Project of Critique”, *Alternatives*, 27 (2002), pp. 327-350.

③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他的结构语言学理论曾为20世纪语言学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可参阅由后人整理出版的他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和叶蜚声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④ 对奥斯汀的“言语行动”理论的评介,可参阅雨民编著:《英语语体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第282-283页。

⑤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 p. 287.

会存在。于是,分析言语行动成为具体解析沟通行为的关键。第二,承认和尊重共同的规范标准。沟通行为的合理化所赖于社会全体成员对公共规范标准的认可。为此,获得承认和尊重的规范标准应该是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被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的东西。规范的合法性应该建立在经话语过程而获得所有受到该规范影响者的赞同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习俗或传统的基础上。<sup>①</sup>

由此,哈贝马斯指出合理的沟通行为涉及到对话过程中的道德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一种理想的会话情景即“话语伦理”,试图向现代社会提供一种相互理解、在沟通行为过程中获得所有参与者同意的道德规范体系,以便在非常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日常话语沟通达成共识。于是,参与沟通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参与沟通的各方应该彼此承认、相互平等,所有的需要或要求均通过语言形式加以表述和诠释;第二,参与沟通的各方必须有平等接近话语的权利和机会,或者说,话语对任何对话参与者都是平等的和开放的,要解决争议只应通过理性的理解;第三,对话参与者必要时能够改变自己的立场,能够从发言者的角色转变为倾听者或观察者的角色,能够倾听和接受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sup>②</sup>

语言具有建构事物和表示行动的功能,西方语言哲学对其给予了明确的阐述,这对社会建构主义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 语言作用:社会建构主义的内核

受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启发和影响,1989年,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奥纳夫首次提出国际关系学科意义上的“建构主义”概念。<sup>③</sup>奥纳夫指出,依据建构主义的观点,世界和词语之间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构成的。<sup>④</sup>如果说语言是创造现实的核心工具,那么,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对语言的作用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国际关系学科里,社会建构主义有一个主要分支,称作“批评的建构主义”。这一分支强调了语言、话语和文本在国际关系中的普遍存在性,以及它们在建构世界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sup>⑤</sup>根据“批评的建构主义”,语言通常可以用来建构世界政治中一

系列的“现实”,譬如,通过语言文本方式对国家历史经历及文化特质的反复叙述建构起国际关系中的有关要素,如国家的身份感,“自我”与“其它者”之间的区别等。<sup>⑥</sup>近年来,有研究者努力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平等对话途径建构起一种“政治共同体”,乃至建构起一个全球公正及法制社会。<sup>⑦</sup>

“批评的建构主义”在北美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前面提到的尼古拉斯·奥纳夫。奥纳夫试图通过观察和分析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而对国际关系学科进行“重建”。他对建构主义的界定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人和社会相互建构或构成。他所倡导的建构主义也是以社会行为作为基础的,认为人类通过自己的行动建构现实,在行为之外不再存在事实。<sup>⑧</sup>但是,他所谓的社会行为包括物质的和言语的两个方面,而且它们具有相互构成的关系。

批评的建构主义者感兴趣的问题,是语言行为和实践行为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奥纳夫对语言应用及其规则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世界“现实”的影响进行了观察。在他看来,一定的言语行为经过人们不断重复而变成成为制度化的东西,并由此生出获得分享的规则来,这种得到分享的规则反过来为人们未来的行为提供了有意义的环境和基础。因此,奥纳夫对规则的理解是以言语行动理论作为基础的,“言语行动理论的明确主张是,语言既是再现性的,也是实施性的。人们使用语言代表行动,还使用语言实施行动”<sup>⑨</sup>。显然,语言是奥纳夫从社会建

<sup>①</sup> 转引自 Jaye Ellis,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the Legitimacy of Rules: A Discourse - Ethical Approach", *Alternatives*, 27 (2002), p. 282.

<sup>②</sup> 转引自 Stephen Eric Bronner, *Of Critical Theory and Its Theorists*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4), p. 295.

<sup>③</sup> 参阅 Nicholas G.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sup>④</sup> Nicholas G. Onuf,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 (1994), p. 94.

<sup>⑤</sup> 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探讨语言、话语及文本在世界政治、国际安全和国家对外政策中作用的著述明显增多,例如: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Henrik Larson, *Foreign Polic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France, Britain and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7); K. M. Fierke, *Changing Games, Changing Strategies: Critical Investigation in Securi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sup>⑥</sup>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sup>⑦</sup>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sup>⑧</sup> *Ibid.*,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p. 36.

<sup>⑨</sup> *Ibid.*,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p. 82.

构主义视角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工具。其中语言不仅描述和再现“现实”，而且建构着“现实”。或者说，语言创造着世界。

言语行为不仅可以产生直接的社会影响，而且还是一种涉及伦理价值后果的活动。经过语言作用而生成的规则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奥纳夫认为，政治社会具有两种基本特征：一是人类行为由于规则而具有意义，二是规则导致不平等的利益分配。<sup>①</sup>规则的社会性表现在规则对人类的行为提供指导，使得某类行为在一定的物质及文化环境里变得具有含义。此外，规则带来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规则可以创造行为体；反过来，行为体对规则构成影响，因为每当行为体选择遵循一种规则时，它们往往通过参与规则去改变现存规则或创设新规则。在规则的政治性方面，一定的规则往往给某些行为体带来比另一些行为体更多的好处，“一些行为体利用规则行使控制，从而比其它行为体更有优势”<sup>②</sup>。通过使某些行为体从规则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规则得以在社会机制中确立起一种稳定，即人们所称的“秩序”。这种稳定或“秩序”通常会被竭力地加以维持，因为努力维持这种稳定或“秩序”的行为体可以从这种稳定或“秩序”中获得最大的好处。<sup>③</sup>于是，规则的问题既是一个关于政治特权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伦理道德的问题；而所有规则又都是从言语行为中发展而来的。

于是，关于语言使用的伦理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被提了出来。近年来，“批评的建构主义”开始对世界经济及政治生活中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来源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倡导通过平等对话和沟通生成相对公正、平等的全球政治、经济及文化权力结构。该分支不仅强调权力的场所应该存在于国际法、国际组织或机构中，而且鼓励在全球政治、经济和知识等领域建立平等对话和沟通机制。在这种对话和沟通机制中，各种不同的声音应该得到平等和充分的表达、倾听和交流。持这种主张的一个理论假设是，平等对话和沟通有可能使对话参与者之间形成并分享全球集体认同、价值和观念，从而使某些行动和规则的道德性、公正性及合法性得到确认。

的确，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包括对政治语言的研

究，因为语言和国际关系之间存在着交织密切的关系。如同在其它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在国际关系学科方面，人们主要是通过语言从事研究。国际关系或者被书写，或者被口头表述出来，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不同的语言往往表达着不同的“世界”，并创造着不同的“现实”。语言是符号系统，它对国际关系事件进行记录，当人们通过文字把国际关系事件表述出来时，这些文字将这些事件作为“知识”记录下来，而且其本身成为国际关系事件的一部分。人们正是通过（文字或口头上的）语言讨论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获取或调配国家资源和发出军事命令。在国际关系中，语言本身还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权力。譬如，语言可以是操纵和控制危机的基本工具。如果说发动战争需要理由，那么，战争决策者正是利用一系列话语建构起这类理由。讲话者是谁？通过谁向谁讲话？讲话的内容是什么？讲给谁听？使用语言的方式是怎样的？讲话者讲话时处于何种环境？所有这些都是帮助理解特定的语言含义的关键要素，并且构成了国际关系或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于是，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行为体往往会对另一个行为体所发出的语言含义进行理解并作出反应，而不一定是对直接的“事实”作出反应。

“9·11事件”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国际关系事件，进一步说明了语言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并为人们从理论和经验上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机会。譬如，在美国，一系列新的政治话语如“反恐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塔利班”、“圣战”（jihad）、“先发制人”、“文明世界”和“邪恶世界”等正式进入美国对外政策话语系统，并逐渐取代着旧的对外政策模式中的语言表述；这些话语帮助美国决策者理解和建构着“9·11事件”后世界政治及安全“现实”，建构着语言应用与战争行为的关系。此外，在全球层面，政治语言背后的伦理含义以及全球民众政治话语和国家对外决策者话语之间相互影响等问题也凸现出来。

<sup>①</sup> Ibid,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pp. 21 - 22, 128.

<sup>②</sup> Nicholas Onuf,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in Kubalkova Vendulk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nstructed World*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p. 63.

<sup>③</sup> Ibid,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p. 61.

## 语言问题:社会建构主义内部分歧所在

所有的社会建构主义者都认为,人类行为以及社会现实的含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是至关重要的。这类含义并不存在于某种“客观”世界里等待人们去发现,也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大脑里,而是还存在于社会实践中,而且是可以为人理解的。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没有得到与其它行为体沟通的含义是空洞的。那么,人类行为的含义和社会现实的含义是如何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呢?社会建构主义内部——尤其在“批评的建构主义”和“温和的建构主义”之间——对此持不同的认识。

“温和的建构主义”分支主要受西方结构化理论和科学实在论的影响。结构化理论呼吁社会科学家关注对社会实践的研究。“温和的建构主义者”响应了这种学术上的呼吁,并寻求将一种社会学研究视角应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应当指出的是,当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异军突起时,“温和的建构主义”分支表现突出并且颇具影响,在挑战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学派的过程中成为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其领军人物之一是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温特对建构主义的界定依据了一般社会理论的两项基本原则:一是人的行为建立在含义基础之上;二是含义产生于相互作用。他的建构主义观点使用了来自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关注认同(身份)问题,假定人的自我观念及实践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并由此创造着社会现实。

需要指出的是,温特是在国际关系学科里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持续争论的背景下提出上述观点的。社会建构主义这一分支的“温和性”表现在,它没有完全否定均属于理性主义范畴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温特试图在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搭建起“桥梁”,并把自己的建构主义方法置于理性主义阵营和反思主义阵营之间。<sup>①</sup>后来,他又讲到要在“主流”方法和“后现代”方法之间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sup>②</sup>此外,温特所倡导的建构主义主张是以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新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基础的。<sup>③</sup>不过,他对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环境和相互作用等问题有自己的看法:第一,赞成把国家行为体

作为国际政治分析的核心单位,但是认为行为体的性质不能独立于它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第二,承认行为体所处的国际环境具有无政府状态特征,但是并不认为这种无政府状态特征是静态的或不变的;第三,认为国际政治行为体和环境之间存在着关系,但它们是相互构成的关系。

“温和的建构主义”假设了一种不断变化和运动的国际政治。在温特看来,国际环境不仅是物质的,而且具有社会特征,譬如观念、规范和含义等;国际环境也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行为体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行为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行为体之间的主体互动不断建构着国际环境。反过来,国际环境规定和影响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体也是动态的,它们的利益和身份也是可变化、可伸缩的;行为体是谁(身份)、行为体想要什么(利益)是由它们与其它行为体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处的环境决定的,而不是外源的、特定的或一成不变的。这种行为体和环境之间相互变化、相互构成的循环关系构成了“温和的建构主义”的核心内容。<sup>④</sup>

在“温和的建构主义”中,各行为体之间以及行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分别(再)建构了行为体的利益、身份、行为以及行为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并由此赋予它们不同的含义。那么,造成各种含义相互作用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在温特的笔下,国际政治主要还是在行为体之间“无声的对话”中进行的。行为体之间彼此并不讲话、没有沟通,只是相互发出非言语信号。国际政治的社会互动就是发送和诠释这类信号,并对这类信号进行回应的过程。<sup>⑤</sup>尽管“温和的建构主义”经常提及语言的重要性,但是没有系统地说明语言作用的问题。温特的沟通概念类似于理性主义理论中行为体交流的观点。长期以

<sup>①</sup>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1982), p. 394.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另一名美国学者彼得·卡森斯坦和他的同事们参与了温特的研究项目,其成果是: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sup>②</sup>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1页。

<sup>③</sup> 关于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新现实主义理论,可参阅他本人的著作《国际政治理论》。该书已有几种中译本。最近的一个中译本于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信强译,苏长和校)。

<sup>④</sup> 温特对“温和的建构主义”的阐述以及在这方面的建树,主要集中在他所写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以及他在该书末“参考书目”中所列举的自撰文章里。

<sup>⑤</sup> Ibid,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p. 405.

来,国际关系理论“主流”范式一直强调对行为体物质行为的研究(譬如关于战争或暴力的物质特征),忽视言语沟通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理性主义”行为体是相对封闭的“独白者”,行为体之间缺乏“对话交流”。在理性主义的几个著名的“博弈论”行为模式里(譬如“囚徒的困境”),行为体之间彼此没有言语上的沟通和交流,只有被隔离中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对“其它者”的理解是建立在“自我”经历和主观判断的基础上。这种“沉默”或“独白”不仅构成国家对外决策上的困境,而且使国际关系现实中的许多重要方面(譬如正义问题、合法性问题以及诚信问题等)难以在这类“理性”行为框架里获得系统的说明。

温特自己认为,在认识论方面,他是站在“实证主义”一边,尽管在本体论问题上,他更接近“后实证主义”的立场。<sup>①</sup>他接受了理性主义的诸种假设和看法:在大多数情形下国家被看作是理性的行为体,而且它的存在先于体系的存在;物质利益和权力仍然是重要的因果力量;对社会世界进行科学的研究是必要的,具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需要采用经验和实证的手段等。<sup>②</sup>这些使他从根本上更加接近他所称的国际关系“主流”学派。他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书名和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书名之间在英文里只有一字(即“social”,意为“社会的”)之差。温特本人称,他所提出的建构主义是一种“色彩较淡的建构主义”,他所要捍卫的是一种“温和的”和“弱式的”建构主义。<sup>③</sup>于是,有研究者指出,温特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建构主义者,或者说只是一个“犹豫不决”的建构主义者。<sup>④</sup>

“批评的建构主义”将语言放到了世界政治分析的核心位置上,认为语言是建构人类行为含义和社会现实含义的重要工具。在本体论上,“批评的建构主义”承认存在着一个无可争议的物质世界,但同时认为世界政治现实的社会环境(譬如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讲是语言建构的产物,并使这种环境中行为体的行为具有含义。语言作用与世界政治现实含义之间的这种关系导致人们提出认识论上的一个问题,即如果说对世界政治现实以及行为体行为的含义进行社会建构的语言工具是受主观支配的话,那么,建立在价值中立基础上、不带价值偏见地去使用这种

工具的情形是不可能的。于是,“批评的建构主义者”如奥纳夫等人,一再提出探讨国际关系中因语言使用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伦理问题,探讨国际关系中的公正性、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含义问题。

看来,社会建构主义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简单。其复杂性不仅在于它们在谱系学上表现为存在着哲学上的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学科里的建构主义,而且,社会建构主义强调了行为体、环境及其相互作用的动态性和变化性,以及语言在建构世界“现实”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人们在理解社会建构主义时应该意识到这种复杂性,尤其是“批评的建构主义”就语言作用问题所提出的见解。

## 结语

“批评的建构主义”比“温和的建构主义”更充分、更系统地揭示了语言使用对世界政治现实的建构作用,这不仅丰富了社会建构主义本身的理论含义,而且也为社会建构主义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道路。

当然,社会建构主义尤其是“批评的建构主义”需要回答以下一些问题:如果说在国际层面尚不存在或者说缺乏一套得到普遍分享的政治文化,那么,处于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中的人们有没有可能就具有合法性的国际规则而形成共识?在权力政治仍然起作用的情况下,全球平等对话的可能性有多大?对话参与者进入“对话大厅”时会把权力留在门口吗?既然话语无处不在,那么,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领域,话语在什么时候更发挥作用?如果对话与实践之间相互建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有效的方法和工具是什么?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对话的世界”,还是一个“独白的”或“难以对话的世界”?这些问题是尖锐的,涉及到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问题,尚需从理论上给予进一步的说明。○(责任编辑:黄昭宇)

<sup>①</sup>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10—111页。

<sup>②</sup>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1995), p. 71.

<sup>③</sup>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2页。

<sup>④</sup> Erik Ringmar, "Alexander Wendt: A Social Scientist Struggling with History", in Iver B. Neumanne and Ole Wae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282.